

朱|杰|勤|文|集

史学理论

SHI XUE LI L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理论 / 朱杰勤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朱杰勤文集)

ISBN 978-7-5495-0231-8

I. 史… II. 朱… III. 史学理论—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4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5.25 字数: 436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古代史学史	1
读史为公民之修养	247
记王仲瞿夫妇	255
中国史学研究	257
战时历史教育问题	291
关于人才问题	296
武德之研究	300
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	306
史论	311
评朱伯康著《中国经济史纲》	315
关于在广东地区展开东南亚研究的问题	319
我国历代关于东南亚史地重要著作述评	325
岑仲勉先生对于西域史地的研究	
——岑著《汉书西域传地里考释》校后记	342
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	347
终身治学不辍 遂成一家之言	
——怀念著名东南亚史学家许云樵先生	351

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	354
记著名东南亚史专家陈育崧	
——兼评介《椰阴馆文存》	359
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粗浅体会	367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372
纪念梁方仲教授	378
抚今忆昔话社联	380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朱杰勤教授贺信	382
朱杰勤与周慕良、塔娜之间的通信	386
朱杰勤先生致王贵忱先生的五封信	395

中国古代史学史



目 次

第一章	导言	7
第二章	中国史学的兴起	9
第一节	文字和史	9
第二节	“巫”和“史”	10
第三节	史官的种类及其职务	12
第三章	先秦史籍评述	14
第一节	《尚书》	14
第二节	《春秋》	16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	20
第四节	其他史籍举要	23
第五节	先秦史学综论	26
第四章	秦汉时代的史学	28
第一节	秦代史籍考略	28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	30
第三节	班固及其《汉书》	45
第四节	汉代其他史家及史籍	48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学	52
第一节 三国时期史学发展迟缓	52
第二节 两晋史学的重振	53
第三节 范晔与《后汉书》	56
第四节 三国史的撰著	61
第五节 陈寿与《三国志》	62
第六节 晋史与十六国史	65
第七节 南北朝史简述	68
第六章 隋唐的史学	74
第一节 隋代史学的一瞥	74
第二节 唐代官修的史籍	75
第三节 唐代一些史家及其著述	80
第七章 刘知幾的史学	82
第一节 刘知幾的著作生涯	82
第二节 《史通》创作的过程	83
第三节 刘知幾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86
第四节 刘知幾在史学界的影响	92
第五节 《史通》的缺点	94
第八章 五代及宋修撰的唐史及五代史	96
第一节 《旧唐书》	96
第二节 《新唐书》	97
第三节 《旧五代史》	98
第四节 《新五代史》	100

第九章 《资治通鉴》与通鉴学	102
第一节 《资治通鉴》的撰述经过	102
第二节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107
第三节 《资治通鉴》的注释家	114
第四节 《通鉴外纪》及其他	118
第十章 袁枢与其他史学家的著作	121
第一节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	121
第二节 王应麟与其他史学家	122
第十一章 《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	126
第一节 杜佑《通典》	126
第二节 郑樵《通志》	128
第三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	135
第四节 续“三通”的作品	138
第十二章 辽金元的史学略述	139
第一节 辽的史学著作	139
第二节 金代的史学著作	140
第三节 元修宋辽金三史	143
第十三章 明代史学略述	148
第一节 明修《元史》的经过及其成就	148
第二节 明代国史之失与私家著作之盛	151
第十四章 清代关于明史的撰述	157
第一节 清代官修的《明史》	157
第二节 庄氏史狱与戴名世狱	167
第三节 私撰的各体明史	171

第十五章	清代史学概论	175
第一节	清代史学的时代特点	175
第二节	清代史学家及其著述	178
第三节	旧史的重写补辑与考证工作	182
第十六章	章学诚的史学	191
第一节	章学诚的学术生活	191
第二节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194
第三节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	198
第四节	章学诚的方志学	203
第十七章	起居注与实录	210
第一节	历代的起居注	210
第二节	历代实录的编纂	217
第十八章	历史地理学的著述	226
第一节	历代舆地图集	226
第二节	清代中期西北地理的研究	235

第一章 导 言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自有成文历史以来史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我们知道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针对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按照年代顺序,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况、社会制度等加以具体解释,通过讲解各阶级、政治党派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去说明社会发展过程,并通过综合分析和研究的结果,来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史学史不得不研究历史学家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他的作品在历史学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就不能不研究其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指导思想,明了作者的目的和要求。历史学是上层建筑的产物,它不能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人不能脱离阶级和政治,历史学家也就不能不替自己的阶级、政治服务。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说过:“思报国恩,惟有文章。”他要求自己的文章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史家企图用历史来帮助统治阶级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人,不能因为古代史家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并且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而全盘否定他们。而只能用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来看待他们及他们的作品。

史学史既然是研究史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应该注意到史学家所处时代的学术主流,因为史学不过是当代学术的一个门类,与其他学术门类大有关系,而一个史学家又往往擅长多种学科,如果我们不明了当代文化的全貌或学术的主流,我们就很难正确地评价这些史学家及其作品在整个学术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一本史学名著必有它的学术传统。章学诚(实斋)说得好:“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于《世本》、《国策》;固书之资于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惲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崔骃之注马;服虔、应劭

之释班是也。”^①我们找出历史学家和学派的作品承先启后,因袭和独创的地方,便可以阐明史学本身发展的源流。

史学家的观点、立场、方法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研究史学史必须注意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可是我国过去研究史学史的人,往往注意史学方法,特别是体例,而阐明史学思想的少。史学方法是由史学观点所指导,如果作者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掌握正确的史学方法。不少古代的伟大史学作品流传至今,由于作者的阶级出身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作者的才力发挥尽致,但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多可议的地方。我们研究古代史学史的人,应该历史地来看待史学作品,从实际出发来评价它的作用和地位,并且批判地继承它。关于现代史学,我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作斗争,并从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事实和过程,要对资产阶级史学进行具体批判。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来批判和继承我国的史学遗产,批判资产阶级史学作品,并探讨史学的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结论,扩大史学的领域,丰富史学的知识。把史学史提高到一个新的比较高的水平。

史学史虽然述及史学家的生平,但不同于史学家的传记,因为它还研究作品的具体内容。史学史也胪列了许多作品的名称,但它不同于目录学或史料学,因为它除举出若干作品名称外,还讨论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史学方法,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史学史也谈到著史体例,但又不同于历史编纂学或西人所谓著史术,因为它涉及每一具体作品的思想性与原则性和史学本身的源流正变,以及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史家的时代背景。

史学史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与其他有关的学科部门互为影响。它的范围之广,应该与史学相当。比如说,《隋书·经籍志》史部,就包括地理^②。清代《四库全书》乙部(史部)也把地理类书放入其中^③。史地二门,有时很难划分得太清楚。我们研究中国史学史,往往必须论及某些历史地理书籍。

中国史学史在今日看来,还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薄弱门类。解放前,似乎只出过一种较好的专书,即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此书材料相当丰富,条理颇为分明,行世已久,但在今日看来,仍使人有不满足之感。目前,史学界正大力开展史学史的研究。逆料不久必有比较完善的中国史学史出版,“企余望之”。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永清县志列传序例》,第43页。

② 《隋书·经籍志》分史部为十三类,第十一类地理记(《山海经》、《水经》以下诸地理志一百三十九部属之)。

③ 清代修《四库全书》史部分十五类,地理归入第十一类。

第二章 中国史学的兴起

第一节 文字和史

有文字而后有成文的历史,原始社会有文字的创造,而没有史学的发生。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但文字的创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结绳和绘画。

所谓结绳记事,是记录事件的一种尝试。本来用以记数而打的结,在许多民族中间,成为记录事件和传递消息的手段。在中国古书上也多次提到古代“结绳”的事。如《周易·系辞下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庄子《胠篋篇》也提到上古容成氏等12个时代“民结绳而用之”。许慎《说文》叙说:“神农氏结绳为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测中国上古时代是有过结绳记事一说的。但究竟怎样结法,我们没法知道。《周易正义》引郑玄注倒提到了一点,说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不过这话实在模糊得很。在古代秘鲁也有结绳记事的方法,叫做魁普(Quippus),即用不同长短不同颜色的一些细绳,相隔不同的距离,打着不同形式的结,而这些细绳又都拴在一条主绳上。它的用途,从经济核算,人口调查,直到作为大事发生年代的大事记等,并不相同。我们的祖先也可能有和他们大同小异的做法^①。

绘画亦称图画文字,发明在结绳记事之后。它的发明是由于劳动合作的需要,并且是群众知识增广的结果。它比结绳实用,应用得更广泛。例如,原始人打猎,打倒了一头牛,他想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用结绳的办法是不成的,于是照着野牛的模式

^① 参看柯斯文著《原始文化史纲》(人民出版社)第199页及丁易著《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中外出版社)第5—6页。

样画下来,人一看便明白了。如果他要把猎取野牛的经过告诉别人,又可以多画几个相关的图画,就可以把自己复杂的意思传达给别人了。这种做法,效果远远超出结绳之上。而且结绳记事很不方便,因为有绳才能结起,如果没有绳或忘记带绳,就没有办法了。以图画代结绳,自可随时随地刻画起来,或用白土,或用黄泥,或用石头,地上、壁上或树皮上都可以成画,而且工具俯拾即是,避免了携带绳索的麻烦,这是文化上的一大进步。这种图画是象形文字的先驱,例如马,以后在甲骨文,甚至篆书中也是作马形的。

文字从图画发展而来,也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出现比较定型的文字,已经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了。有文字而后有成文的历史。文字的数量逐渐加多,可以记载简单的事情,而后才有文献史料。阶级社会,一般来说,民众被划分为两个敌对阶级,即自由民和奴隶。从此而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社会性质起了变化,文字也跟着起了变化,从简单到复杂了。原来创造文字的自由劳动人民,现在已沦为奴隶,而统治阶级奴隶主却从劳动人民那里将文字掠夺过来,作为统治奴隶的工具。《易·大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所谓圣人,就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些知识分子,即帮助奴隶主来剥削和压迫奴隶的人。这批具有特权地位的人被称为“巫”和“史”。

第二节 “巫”和“史”

巫在原始社会已经存在了。最初他们还是参加劳动的。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界许多现象不了解,黑夜的浓重,火山的爆发,日月星辰的转移,暴风雷雨的袭击,动植物的繁殖和生长,都使他们感到奇怪和威胁,但他们又无力克服。于是误以为一切自然物象都由神灵主宰。这种万象有灵的信仰,稍后便发展为自然崇拜,再后又发展为祖先崇拜。对于这些信仰、崇拜,原始人是有一些仪式的。这些仪式开头是咒术,稍后就是祭祀、祈祷、筮卜等。举行这种仪式的时候,必要假手比较有智慧和经验的人,而这种人干得多了,就把这种求神问卜的勾当作为自己的职业。人们就称他们为巫,后来又叫做“史”。

上古的巫是受人尊重的。第一,因为别人要求神助的时候,主要依靠他们作为媒介,而巫亦以“通于神明”自命,抬高自己的身价,甚至能够假做神语,指挥他人,使他人唯命是听。第二,由于职业关系,巫与自然界事物接触比较多,对于自然观察得

比较认真,也逐渐总结出一些自然规律来。例如观察到潮汐的涨落上应星宿的变化,就可以领悟出一些粗糙的天文学知识。他们逐渐掌握季节的变化,知道播种和收获的适当日期。又由于巫知书识算,劳动人民也要依靠他们解决田地界问题和收获物的分配问题。这样他们就赢得了群众的敬畏。不过,在原始社会里,巫所做的祈祷、卜占等事,基本是为着整个氏族的福利,他们还算是为人民服务的。

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阶段,分配的不平等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社会就出现了奴隶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产生。统治阶级利用暴力来保证他们的富裕生活和崇高地位,并且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这种统治阶级可以说是暴力集团,但他们又必须与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使这些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达到一方面用智,一方面用力来统治人民的目的。这个时期,巫师多数是统治者的亲信。他们假做神语,由武力集团执行,用以蛊惑百姓。《国语》所举“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正是一个例子。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不论军事还是祭祀照例要经过“人谋、鬼谋”。人谋即集议于众以定办法,鬼谋即通过卜筮以考吉凶。巫师为祭祀必不可少的人,他们与军事领袖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有几乎同等的重要性。那么,巫师必定要参与国家大事的裁决。由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智的逐渐提高,巫师的威信直到春秋战国才逐渐降低下来。例如,春秋时代,在一次两国交战中,其中一方的主帅要采取攻势,巫师就提议由卜筮来决定。主帅断然拒绝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说完毫不动摇地出兵进攻。又如有个巫师梓慎,夜观天象,宣布七日内将有风火之灾。果然七日内,宋、卫、陈、郑皆火。他又预言说,数日内又再发生火灾。郑国巫师裨灶对执政者子产说:宋、卫、陈、郑将同日火,如果给我瑾瑜玉璆来祭天,郑必不火。子产不给他。裨灶又说:不采用我说的话,郑必遭受第二次火灾。郑国的人民也请求子产。子产认为不可以给,并解释说:天道远,人道近,二者不相及。意思是我们怎样知道天会降灾呢?裨灶又怎样会知道呢?并且子产斥责裨灶是造谣惑众,加以拒绝。结果也没有火灾发生^①。到春秋末期,孔子就不相信鬼神了。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患病,别人请他祈祷。他就用“我早已知道了”这一句话来搪塞人家的劝告(见《论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巫的地位一落千丈。

^① 这段文字是《左传》用来解释《春秋》“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一条文字而补充的事实。赖有《左传》这样的补充,否则我们对于《春秋》寥寥十多个字的经文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了。《公羊传》就没有结合史实,乱发议论说:“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异其同日而俱灾也。”像这样解释就没有什么启发意义了。

巫做官之后,又获得了一个尊号,那就叫做“史”,即史官。史最初是由巫兼任的,因为巫是最有文化的了,如果要选拔文官的话,非从巫师当中选任不可。在中国古书里,巫、史并称的很多,如《周易·巽卦》说:“用史巫纷若。”《国语·楚语》:“家为巫史。”等等。而甲骨文中,也有史字。大约在殷商时代,巫、史已经合流了。

自 1888、1889 年起,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字,就是殷代卜时命龟之辞(钻孔,以火烧之,视其裂痕,所问之事书于版上,如祭祀,征伐,渔猎,晴雨等),这些都是巫师所写,刊于龟甲及牛骨上^①,同时也是商代的史料,对研究商代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些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巫史二者的职务是相通的。

第三节 史官的种类及其职务

根据记载,四五千年前黄帝时就有史官苍颉。许慎《说文》自序:“黄帝之史苍颉。”又《汉书》的古今人表,于黄帝下列苍颉,注为黄帝之史。《太平御览》引宋衷《世本》:“沮诵、苍颉,黄帝之史官。”《鹖冠子·王铁篇》:“士史苍颉作书。”《吕氏春秋》:“史皇作图”,高诱注:“史皇即苍颉”。把创作文字图画的功效推在苍颉身上。我们知道,许多古帝王的名字都可以被理解为氏族或民族英雄的名称,他们的事迹都是古代劳动人民中英雄的事迹和强大创造力的体现。黄帝,作为当时的一位君主,可能是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盟长,为人民所爱戴。今日我们还记得他,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图画文字的发明,是集体的智慧,决不是一个人的功绩,但这是值得歌颂的事情,于是人们只得找出一位代表作为纪念和表扬的对象。至于黄帝时代有无史官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我认为苍颉可能是一个巫。不过文字已经创造出来了,记载有所凭借了,自然也会产生文字的记载,史籍的萌芽。

夏商之际,史官的数目应该不会少,我们在中国古书中就可以找出五六个人,据我看来,他们都是巫史或一般文官之类,但我们找不到他们的具体作品(甲骨文没有作者的名字),因此不列举了。

周代史官制度已经确立了。史官的名目大约有下列各种。

(一)大史 大史的地位颇为崇高。新王登级,大史参加策命的典礼。国王有事会问于大史。《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大史)大史还

^① 引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月刊第 45 期)。关于甲骨文的著录和研究不属于本编研究范围,故不详述。